

纪录电影《武汉日夜》在京首映

据新华社，抗疫题材纪录电影《武汉日夜》近日在京首映。影片由30位摄影师在战“疫”一线取景拍摄，以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及病患为主线，展现了普通人在疫情面前守望相助、共克难关的温暖故事，以此向英雄的城市、英雄的人民致敬。

首映式上，《武汉日夜》主创团队通过在北京、武汉两地连线互动，再现拍摄地武汉这座曾经被按下“暂停键”的城市，重回烟火人间的温暖景象。影片出品人曹寅介绍，作为国内首部进入院线发行的抗疫题材纪录电影，《武汉日夜》记录下特殊时期普通人的点滴生活，捕捉闪耀的人性光辉，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。总制片人李玮表示，希望用艺术语言，表达生命至上、人民至上的主题，礼赞英雄的城市和英雄的人民。

据悉，《武汉日夜》将于1月22日在全国上映，并在武汉、荆州、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重庆、广州、长春、拉萨、乌鲁木齐、海口等全国70座城市推出逾350场公益观影活动。

理念更新 传统文化“上新”

据人民日报，原创民谣中融入悠扬的黄梅戏、快板、京剧和流行的说唱结合，中国古典舞混搭街舞……央视综合频道推出的《上线吧！华彩少年》，向观众展现了青春力量和传统文化相遇的相遇。35名少年来自五湖四海，其中有实力不凡的高校学子，有功底扎实的院团演员，还有非遗技艺传承人。婉转吟唱，水袖挥洒间，跃动着他们对传统文化热爱、融入巧思的现代表达。

其实，这几年类似的“破壁”和相遇并不少见。重大考古项目、精彩文化展览，总是引发“围观”；许多纪录片和短视频将镜头对准非遗技艺，获得高分点评；《中国诗词大会》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等文化类综艺节目播出，掀起观看热潮；既有颜值又有底蕴的创意产品，成为电商爆款。“与古为新”，为越来越多人创造了亲近传统文化的场景，让传统文化以更轻盈灵动的姿态走进年轻人的心灵。

想要为传统文化“上新”，离不开理念的更新。不是穿上汉服、练段武术就叫传承，要找到有共鸣的视角、有深度的思考，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向更多人传递我们的精神之美、价值之美，让传统文化和现代表达美美与共，而不是汲于符号的堆砌，止步于空洞的表面。

这才是我们该追的剧

据人民日报海外版，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的2020年年度收视综合数据，2020年12月27日起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《跨过鸭绿江》，仅凭前7集，就以2.086%成为2020年下半年黄金档电视剧收视冠军。2021年新年伊始，该剧继续高歌猛进。CSM全国网数据显示：截至目前，《跨过鸭绿江》平均收视份额5.29%、豆瓣评分8.6，是2021年以来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。

这部剧也引发了强烈社会反响。包括抗美援朝老战士、志愿军后代等众多业内外人士都对该剧给予了高度评价，一些年轻网友也加入了追剧大军。表示：“这才是我们年轻人该追的剧。”92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李建功，每晚都准时守在电视机前收看该剧。能够得到亲历者的认可，这是《跨过鸭绿江》受到的最高褒奖。

该剧全方位为观众展现了抗美援朝的起因、经过、防御、反击以及最后的胜利。有专家评价，该剧场面宏大、真实震撼，逼真地再现了弥漫血与火的抗美援朝战场。一些业内人士说，这部剧“戏剧张力”强，抒情真实感人。宏大的叙事格局和催人泪下的战争场面相结合，引人思考，促人奋发。“有观众评价，该剧气势恢宏，但叙事不疾不徐，沉稳大气。”

《熊出没·狂野大陆》成功走向海外

据北京日报，春节档影片《熊出没·狂野大陆》还未正式跟观众见面，海外也即将掀起围观“熊”潮。根据该片片方提供的数据，目前《熊出没·狂野大陆》已预售至美国、加拿大、拉美、英国、法国、俄罗斯等近十个国家和地区。

截至目前，《熊出没》系列动画作品已发行至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累计出口超20万分钟，被译制成英语、俄语、印度语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意大利语、法语等多个语种，全面覆盖院线、DVD、电视、新媒体等渠道。全球许多国家都在观看《熊出没》动画作品，感受中国动画的魅力。

《熊出没》这一动画IP为世界观众展现了中国东北森林的壮美景观以及中国文化，作品中关于亲情、互助、成长等主题也得到全球观众的肯定。《熊出没》电影在俄罗斯上映时，就有观众评价：“充满善意与爱的故事，中国创造，做得好。”“这不是俄罗斯动画，也不是美国动画，而是一部真正的中国动画，它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特色。”非洲的孩子们则表示这一动画“教会他们要诚实、要努力、要团结合作”。

在国内，《熊出没》系列作品在央视少儿等全国200余家电视台和新媒体持续播出，不断刷新收视纪录，长居中国动画网络点击排名榜首，点击量超3000亿次。六部《熊出没》系列动画电影以近27亿元总票房位居国产动画前列。

(口记者 张依盟 整理)



北师大教授李景林解读荀子思想时认为，荀子针对孟子的性善论而言“性恶”，其实质是强调人性中本无“现成的善”——

为什么荀子“性恶论”不是“实质恶”

专家精解

本报记者 于国鸣 实习生 蔡明玉

后儒对荀子的批评，主要集中在其“性恶论”。在山东省尼山书院举行的“荀子公开课”上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景林解读荀子思想时认为，荀子针对孟子的性善论而言“性恶”，其实质是强调人性中本无“现成的善”，而非言人性中具有“实质的恶”。荀子并不否定孟子所谓的人本具先天资朴之美、心意之善，但在荀子看来，人之初生，便必已出离质朴，处身于文明之中。

李景林从人性的内容、人性的结构和人性实现的目的论指向三个方面来分析荀子的人性论，从而解读荀子的人性论及其政治伦理学说的自洽性。李景林认为，荀子的人性结构论，既凸显了礼义教化的必要性，同时，也蕴涵了人达于“善”的可能性。在荀子看来，人的存在及其伦理的体系，应是一个始终相扣的自足自治的系统。

人性也包括“注错习俗”

李景林说，荀子的人性论及其政治伦理学说的自洽性，可以从人性的内容、人性的结构和人性实现的目的论指向三个方面来分析。过去对荀子的批评，主要集中在他的“性恶论”。其实，荀子所强调的，并非人性中具有“实质的恶”。

不妨先看看后世儒家对荀子“性恶论”的批评。一种是批评荀子失了“大本”。如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说，“荀子极偏驳，只一句‘性恶’，大本已失。”所谓“大本已失”，就是说把根本性的东西丢掉了。

也有种说法认为，荀子轻忽源头而重末流。王阳明持此种观点。王阳明说，“孟子说性，直从源头上说，亦是说个大概如此。荀子性恶之说，是从流弊上说来，也未可尽说他不是，只是见得未精耳。”还说，“孟子从源头上说性，要人用功在源头上明彻；荀子从流弊上说性，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，便费力了。”

另外一种批评荀学为专制乡愿的根源。比如谭嗣同说，“两千年之政，秦政也，皆大盗也；两千年之学，荀学也，皆乡愿也。”

此外，荀子有两个很著名的弟子韩非和李斯，这两个弟子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，韩非是法家重要的理论家，李斯是法家重要的实践家。不过，不能因为这两个著名弟子是法家，就判定荀子是法家。从人性论上分析，法家的人性论认为，人性里边本有“实质之恶”，所以在政治上，法家强调外力的社会强制。荀子不一样，荀子虽然提出“性恶论”，但是他所谓的性恶，不是人性里边必有“实质之恶”，所以荀子的人性论，一方面在政治上没有主张形成外在强制的理论，另一方面在教化上也特别强调自力，就是返归自己。可见，荀子的思想学说并未脱离儒家精神的方向。

古代哲学家谈到性时，普遍认为性是先天或者天然如此，这一点各家都是相通的。《荀子·性恶》篇中说，“凡性者，天之就也，不可学，不可事。礼义者，圣人之所生也，人之所学而能，所事而成者也。不可学，不可事而在人者，谓之性；可学而能，可事而成之在人者，谓之伪，是性伪之分也。”显然，荀子也



认为，“凡性者，天之就也”“不可学，不可事而在人者，谓之性。”所谓“天”，指自然。人则是指“伪”，在荀子这里，“伪”是一个特殊的提法，就是人为的意思，指通过学习与现实修为所获得的东西，包括学到的知识和人格修养。这个“伪”没有什么负面评价的含义。

同时，荀子认为，“不为而成，不求而得，夫是之谓天职”，天有天的职分，人有人的职分。天指自然，而且天行有常，有其自身的“规律性”，和人没有关系，和社会的治乱也没有关系。

明确了天、人之别，荀子认为人性的内容包括哪些呢？《荀子·天论》篇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天职既立，天功既成，形具而神生。好恶喜怒哀乐臧焉，夫是之谓天官；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，夫是之谓天官；心居中虚，以治五官，夫是之谓天君。”在这里，“天情”“天官”“天君”都是属于人性的内容。值得注意的是“天君”，“天君”指心，人所有的情感活动，以及受欲望支配的活动，都要受制于心的规定、自觉和约束。

李景林表示，还要特别提一点，荀子所言的人性，不仅包括“天情”“天官”“天君”，而且还包括人能够“注错习俗”，错就是措置，指意志导向，习是指实践活动，从而形成一种风俗。“注错习俗”是道德抉择和修习的能力，也包括在人性里边。

“从心中所可”就有了善恶

荀子的“人性恶”，非是指人性中具有“实质的恶”。这一点从分析荀子关于人性结构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。

人性包含的内容很多，但并不是并列杂陈、相互没有关系的。人性的内容要在整体结构里边，才能展现出其作为人性固有的特质，所以它是动态的，而不是静态的。

《荀子·性恶》篇中说，“凡性者，天之就也，不可学，不可事”，是说人性就是直接得自于天的。《荀子·正名》篇中则说，“性者，天之就也；情者，性之质也；欲者，情之应也。”就把结构讲出来了。什么是性之质呢？没有抽象的性，一定要表现在情上，所以情就是性的一个主要内容。

儒家谈论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时，认为是以情来应物的。荀子也持这样的观点，人性要落在心上，心也不是抽象的，心要落在情上，从而动态展示人性的内容。这里谈到了欲，“欲者，情之应也”，欲是什么？欲是欲望要

求，需要接触外物，渴了要喝，饿了要吃。荀子接着又说，“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，情之所必不免也；以为可而道之，知所必出也。”人和动物还是不一样的，动物饿了就吃，渴了就喝，而人饿的时候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是可以不吃的，所以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：人的行为总是受制于“心之所可”，认为对的就去做，认为不对的就抛弃。

在这里，荀子认为，虽然有“必不免”，但还是要以“以为可而道之”作为原则，从而才能够“知所必出也”。这里面包含了“知”，知就是一种自觉，对事情的对或者错，有自己的认识。

《荀子·正名》篇中又说，“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，亡于情之所欲。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，虽曰‘我得之’，失之矣。”就是阐明，国家的安定与动乱，取决于内心所认可的是否合乎道理，而不在于人情的欲望多少，不从根源上去寻找原因，却从没有关系的地方去找原因，虽然自称“我找到了原因”，其实是把它丢了。

什么是治乱呢？治乱就是善恶。所以《荀子·性恶》篇中表示，“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，正理平治也；所谓恶者，偏险悖乱也。是善恶之分也矣。”

治乱即善恶，在于心之所可，亡于情之所欲，由此可见，在荀子看来，并不是说人有情欲人性就恶了，也不是说欲望本身就是恶的，而是在人性的结构里，人的情欲从心之所可，才表现出善恶来。由此，人性的结构就很清晰了：人性表现为情欲，又“从心中所可”。“天情、天君、天官”包括“注错习俗”的能力，都要落在“心之所可”的结构整体里边，去观察判断它善恶的内容。它不仅是一个结构，同时也规定了人的行为的必然方式。

比如说，动物的选择靠本能。人则不一样，一个人所有的行为，包括人的情欲在内，都必然是置于“心之所可”，或是“心之所可”支配下的自觉抉择，这也规定了一个人实现目标的途径和行为原则。以功利为原则，以情欲为原则，还是以道义为原则，以仁义为原则，其所作所为是一个圣人、贤人、君子，或者是一个小人、恶人、禽兽不如的人，都是出自人心所可或所不可。

正因为存在这样的选择，所以一个人的行为就会获得善或者恶，正面或者负面的道德评价。因此，在荀子的思想中，人性的善恶，不是一种实质性的现成的存在，这是理解荀子人性论的一个关键所在。

的中华老字号。历史上的山东极少产竹子，明清时期为了抚恤漕运官兵，允许漕船搭载一定数量的私货沿途贩卖，当时南方盛产竹子，价格低廉，所以许多竹子通过运河运到了济宁。当地人学习了各种竹编工艺，编制了各种手工艺品，如竹筐、鸟笼等，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，至今济宁的竹竿巷仍然有数十家商铺在经营，见证了运河的兴衰和济宁城市的发展。

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建设不仅促进了济宁城市以及商业经济的发展，还对农业种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具有引水、分水、蓄水、排水的功能，保证了运河的畅通，但是在降水稀少的年份，该工程为了保证运河的畅通往往会忽视农田水利的作用，与两岸农田争水，导致农田灌溉水源缺乏；在降水多的年份，又容易形成洪涝灾害，再加上黄河泛滥，济宁某些地区地势低洼，所以明清时期该地区旱灾水灾频繁发生，再加上人为开凿运河以及修建水利工程，从而导致运河和农田水利的矛盾十分突出。清朝时期，济宁直隶州的水灾极其频繁，“州境滨湖带河，尤多水患，非惟沍气，抑亦地势为之”。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修建后，由于常年受到水流的冲刷，戴村至南旺的河道越来越宽，导致该地区河水时常泛滥，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农业生产，普遍只能种植一些耐水旱灾害的作物，如：小麦、高粱、谷子等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随着政策的支持以及一系列农田水利的修建，济宁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。

运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

到运河中，运河水多的时候，将水储存在水柜中，以此来调节运河水量。水柜除了调蓄丰枯以外，还有沉淀泥沙的作用，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运河的淤积问题。但是仍有一部分泥沙会进入到运河之中，因此人们就会定期对其进行清理淤沙。水闸的作用是调节水量，方便船只经过，在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中修建了许多水闸。《明实录》载：“（永乐九年六月乙卯）会通河成，河以汶、泗为源……自济宁至临清置闸十五，闸置官，立水则，以时启闭，舟行便之。”其中比较著名的是“分水龙王庙二闸”，即柳林闸和十里闸。

竹竿巷见证运河兴衰

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建设使运河恢复了畅通，济宁成为南北水陆要冲、漕船必经之地。至明隆庆、万历年间（1567年—1620年），济宁地区进入了繁盛时期，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商业大都会。《济宁州志》中记载了当时济宁的繁荣：“四百万石漕艘皆经其地，土绅之舆舟如织，闽广吴越之商持资贸易，鳞萃而蜚集。”

南来北往的商人来此贸易和定居，促进了济宁地区经济的发展，商业经济逐渐繁荣，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玉堂酱园和竹竿巷。清康熙五十三年（1714年）玉州船户戴某在济宁州城南门外靠近运河的地方购置了一块土地，创建了酱菜铺，取名“姑苏戴玉堂”，此后酱园得到了迅速发展。清光绪十一年（1886年），玉堂酱园所产的酱菜受到了慈禧的称赞，被定为贡品。近代以来，玉堂酱园在战乱中绝处逢生，慢慢发展，一直延续至今，成为山东著名

济宁城的运河景：城面青山州枕流

罗衍军 王蕊玉

山东运河处于京杭大运河的中段，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山东运河由于自然条件的原因，通航十分困难，所以元明清三代的统治者为了保证运河的畅通，修建了一系列的水利工程，其中就有被誉为“北方都江堰”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。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修建对运河沿线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、城镇繁荣、农业种植以及南北之间文化交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“汶上老人”出良策

明永乐九年（1411年），明政府令工部尚书宋礼等人征调民夫十六万人前往济宁疏浚会通河。宋礼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会通河的问题所在，治河工程未取得明显的成效。由于黄河决口淤积，大运河的“水脊”逐渐移到南旺附近，南旺成为了运河上的制高点，不在此修建分水工程，运河就难以顺利通航。南旺周边有湖泊、泉水等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水源，所以在这里修建分水工程是明智选择。构思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人是“汶上老人”白英，他世居南旺，熟悉这里的环境，于是在宋礼拜访他询问治理运河良策的时候，他提出了“筑堰城及戴村坝，遏汶水使西，尽出南旺，分流三分往南，接济徐、吕；七分往北，以达临清”的建议，由此解决了运河通航问题。

宋礼、白英在修建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时候，为了控制运河的水量，设置了五个水柜分别是：南旺湖、马踏湖、蜀山湖、马场湖、安山湖。当运河水浅的时候，将水柜中的水放